

军史发现

军史

90年前,在位于江西省东南部的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红军。

第26路军原系西北军,在中原大战时为冯玉祥第二方面军第5路军。1930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10月,蒋介石收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任命孙连仲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辖第25、第27师和骑兵师,由河南、河北交界地区移驻山东济宁。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部队建立过组织,一直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1931年2月,蒋介石令该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剿共”,并将其骑兵师留在黄河以北,有意削弱其战斗力。第26路军官兵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甚为不满。南下途中,队伍行动迟缓,蒋介石再三催促,才于3月底陆续到达江西。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第26路军第81旅大部被红军歼灭,该部震动很大。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部进驻已处于中央苏区包围中的宁都县城。

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发展党员。第73旅旅部参谋、共产党员刘振亚经中共中央指定为该军党的特支书记。3月,中革军委选调部分同志进行兵运培训。5月,军委又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即袁血卒)通过各种关系进入第26路军,与刘振亚取得联系。8月,由刘振亚、袁汉澄、王超等同志组成中共特别支部,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团结了一批同情革命的骨干,掌握了部分武装和机要部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遭到蒋介石拒绝,更加深了官兵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开始寻找抗日救国的新出路。中共秘密特别支部根据党中央指示,秘密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发展了赵博生入党。待条件基本具备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指示中共特别支部和赵博生同志,抓住有利时机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在宁都县城外红色苏维埃区域活动的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遵照上级指示,也加强了对第26路军官兵的宣传、瓦解工作。该军许多官兵越来越向往苏区,向往红军。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和参谋长赵博生经过努力,争取了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并通过他们又联

宁都起义始末

褚银



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资料图片

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层军官。

11月底,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分文电被查封,其中有第26路军地下党部分成员的名单。12月5日,蒋介石电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等,送南京惩处。电报被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共产党员)收译,他立即送交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当即召开会议,研究应变对策,决定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之机,组织部队举行起义;由赵博生负责向南昌行营发电“遵令照办”敷衍蒋介石,争取时间;派袁汉澄等前往瑞金与中革军委联系;由赵博生抓紧做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工作,争取这两个旅同时起义。

8日上午,朱德主持召开集王稼祥、叶剑英、左权、李富春等开会,专门听取袁汉澄关于第26路军准备暴动的情况汇报,并研究确定了支持暴动的对策;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如不能争取全部暴动,则以第73旅和总指挥部的部队及其他党员能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如暴动未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离开部队到苏区来,未暴露的继续留在部队中开展工作;暴动时间为12月13日拂晓,暴动前解决反动军官要坚决,行动要快,要注意保密;暴动时尽可能将宁都地主武装头目逮捕。会后,为了支援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毛泽东、朱德等从瑞金来到石城县秋溪村,召开有红军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以红军第4军派一个团和地方武装继续围困石城南面敌军据点,主力在宁都东北郊10公里处的会同地区,

牵制广昌方向之敌第6路军,支援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

为保证起义成功,中革军委指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前往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联络指挥起义行动;派红军第4军到会同地区相机予以策应。赵博生在做董振堂、季振同的工作后,派出共产党员郭如岳前往瑞金与刘伯坚联系。刘伯坚接见郭如岳后,致信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还就起义时间、组织工作和注意事项等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前来请示汇报的第26路军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汉澄回忆,毛主席当时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袁汉澄等返回宁都,向特别支部传达了中革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时,国民党南昌行营发给第26路军的一批冬衣和伙食已运到广昌。为得到这批补给,赵博生等和中共特别支部经过慎重研究,建议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并派出袁汉澄等前往苏区汇报。中革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起义时间改为12月14日晚。

13日晚,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主持召开暴动行动会议,就贯彻中革军委指示发动和举行起义,作了具体

部署。

14日18时,赵博生按预定计划,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在总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除第25师师长、代总指挥李松昆推病未到外,其余留在宁都的旅长、团长们悉数到场。晚8时许,赵博生简明地向到会的军官们讲了国内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正式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席间立刻骚动起来,大多数军官表示拥护;有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布所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学兵连和第74旅一部控制了全军的三部电台;袁汉澄率特务队切断了通往各地的电话和交通线路。接着,第74旅第222团第1营解除了第25师师部武装。李松昆逃到宁都城,带领驻守这里的1个团逃向广昌。至14日深夜,第26路军宁都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15日晨,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携带2万余件武器,整齐地集合在宁都城城南门外梅江沙滩上。赵博生来到队前列,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庄严地宣布起义胜利了,并带头扯下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随后以第73旅为前锋直接开往苏区,受到左权、刘伯坚等军委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第26路军通电全国,郑重宣告队伍已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号召国民党军队进行暴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彻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是在内战紧张、外患严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爆发的。这次起义不仅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而且增强了红军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中革军委当时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1938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长征

第5340期

军史撷珍

钱学森引人才纪事

刘江桂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钱学森作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引育才育才上一些独特的经验做法,对我们今天做好人才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该院刚成立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的情况,作为首任院长,钱学森带领大家白手起家,克服了诸多困难。成立大会上,钱学森跟大家讲,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认真”两个字。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就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时,五院还处于筹建阶段,最初的科技人员只有从有关部门抽调的30多名专家和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生。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周恩来指出:“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

面对迫在眉睫的导弹研制任务,钱学森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有的放矢引进专业人才、组建科技专家队伍,选调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庄逢甘等30多位专家到五院工作。事实证明,正是这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奠定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基础。在钱学森组建的攻关队伍中,还有不少原本对导弹一无所知的行政干部,他们大都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起来、久经沙场的军队指战员。钱学森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导弹技术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导弹发射的基本原理。在后续的发射任务指挥和场地条件建设中,这些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破解人才引进难题,光靠常规手段还不够,钱学森主动找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想办法。当时周总理对聂荣臻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随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被引进调入。力学研究所创建初期只有十几人,钱学森想到当时远在美国的挚友郭永怀,便写信邀请他回国。回国后,郭永怀担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两弹”元勋之一。为了集中选调一批留学生和大学生,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同意国防部五院补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骨干100名,大学毕业生4000名、中技毕业生2000名。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指定组织部部长负责,进行认真审查,按数选调。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技术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研制导弹队伍中。

在钱学森看来,从指导设计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到首次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再到组织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既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关,也是一次培养锻炼人才的宝贵机遇。正是通过这一系列重大任务,五院设立的10个研究室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又成立4个分院,相应领域的人才培养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

为从根本上奠定“两弹”事业人才培养基础,在聂荣臻和钱学森的共同推动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置与导弹相关的专业,国家也下定决心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选送一部分改学原子能和导弹技术专业,其中就有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在内的一大批科技人才。

钱学森的选人用人智慧,关键的一点就是大胆启用青年人才。1964年



钱学森接见科技工作人员。

资料图片

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从起义部队成长为红色劲旅

吴殿卿

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当日,中革军委即决定,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番号。并由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发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为第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第15军军长。同时,派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秘书长刘伯坚前往第26路军新集结地石城迎接并安置部队。此后几天里,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整编问题。

关于整编原则,大家意见完全一致:按照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据此,决定调大革命时期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刘伯坚到第5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先行报到做整编准备工作。同时,从红军学校和部队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如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第5军团工作。但由于任第5军团政治委员,全面领导起义部队整编工作,大家议来议去,一时定不下来。

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第26路军上层军官很大一部分是保定和西北军官学校毕业生,有的还留学日本。第5军团政治委员是一个不仅有能力,还要有资历,有学历的人。会上有人提

议由两次留苏、且在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党代表的萧劲光出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征求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负责指导第5军团建设工作的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事关系重大,应该派萧劲光去。

18日,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深知责任重大,到职后连夜与季振同、董振堂等军团领导交流思想,接着组织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研究改编方案。22日,整编工作全面展开。首先,军委选定的团以上领导干部悉数到位;萧劲光到任后又从部队抽调部分基层干部,陆续分配到第5军团各部队,担任各级政工干部。调到第5军团任职的政工干部到职后,按照军团党委确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治工作方针,有序地开展工作。经过认真考察,党组织及时发展部分思想进步、政治立场坚定、在起义中表现突出的官兵入了党。以党组织为核心,团结进步的、带动中间的、影响落后的,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逐步稳定下来。其次,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研究决定自己的事情;各连队成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彻底废除军官体罚、打骂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坚决纠正劫掠群众财物、欺压老百姓等旧军队思想作风。在改造过程中,军团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

针,立足团结大局,充分尊重和信任部队原有领导,维护他们在部队的威信,还非常重视关心官兵的个人生活。第三,军团政治部组织举办政治训练班,对团以上军官进行红军性质、宗旨、纪律法规以及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为了增强教育效果,使官兵加深对红军的了解,部队轮流前往中央苏区党政机关、红军学校及部队驻地参观学习,让大家亲身体察红军官兵的工作、生活。其间,毛泽东、朱德等多次出面接待,向起义官兵介绍情况。

通过1个月教育训练,部队不仅思想稳定,精神面貌也有了明显变化。在这期间,部分起义军官收到国民党特务的策反信,有的特务还混进部队做策反工作。官兵不为名利所诱惑,大都主动上交了策反信,检举了策反者。到第5军团指导检查整编工作的时任总政副主任聂荣臻曾满意地说:“红5军团开始‘红’了!”

整编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1月底,第14军一名副连长在谣言蛊惑下,乘人不备杀死连里的政工干部,连夜出走;有的营、团干部,甚至个别别的领导也三五成群地议论要离队。这是红军此前不曾遇到过的事,萧劲光立即前往30里外的瑞金请示解决办法。说明情况后,有的领导说先把带头闹事的干部控制起来,有的提出立即调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觉得均不妥,遂找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不能武

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只能用“剥竹笋”的办法,把各种不同想法的人区别对待;不能“割韭菜”,不加区分“一刀切”。

萧劲光听了豁然开朗,他返回后向军团领导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季振同向闹事官兵宣布:已请示过军委和毛主席,起义是大家自愿,去留自由。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给你们发路费。结果,闹着走的人都没走,少数走了的,离队后找不到出路,过了一段时间又自动回到部队。军团机关履行诺言,热情召开欢迎会,欢迎他们归队。风波平息后,军团又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吸收一批在“风波”中表现突出的同志入了党,选拔部分军官进红军学校学习。不久,又打破原师团建制,在军团范围内实行几个大单位官兵混编,使第5军团部队更加团结稳定,军政训练有序开展。

为了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1932年12月4日授予董振堂、赵博生两位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的红旗章。

随后,第5军团在赣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第四及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战略转移中屡建奇功。赵博生、董振堂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汉澄、苏进、孙毅等成长为开国将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